

云南施甸悉昙梵文碑刻考¹

何大勇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540)

【摘要】: 悉昙文字是公元七世纪盛行于印度的一种的古老梵文字母。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唐代有义净之梵语千字文, 智广之悉昙字记。云南施甸县初次发现悉昙梵文碑刻, 对研究云南史和中印佛教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对这种文字无人所解, 民间传说多迷茫离奇。本文对这种文字的定性、何时传入、怎样传入进行考释。

【关键词】: 云南施甸; 悉昙梵文; 缘起流传; 考释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8) 05-0059-04

“悉昙”(siddham), 又作悉旦、悉谈、七旦、七昙, 意译为成就, 或成就吉祥。指印度的梵字字母。公元七世纪以前, 这种文字已盛行于印度。我国南北朝时期, 由译经者传入我国, 且受国人重视而流传, 唐代义净之《梵语千字文》、智广之《悉昙字记》, 都是当时流传之代表。智广撰《悉昙字纪》, 又名《南天竺般若菩提悉昙》, 对悉昙字曾作说明, “悉昙, 天竺文字也。《西域记》云: 梵王所制。……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而中天竺特为详正。……梵僧自云, 少字学于先师般若 1 瞿沙, 声明文辙将尽微致, 南天祖承摩醯首罗之文, 此其是也。而中天兼以龙宫之文, 有与南天少异, 而纲骨必同。健驮罗国喜多迦文独将尤异, 而字之由皆悉昙也”^[1]。悉昙由我国传至日本, 被日本佛学家所推崇。我国称梵字之字体及字母为“悉昙”, 但在日本, 除了称梵字之字体为“悉昙”之外, 梵语书法、读法、文法都称“悉昙”。我国云南施甸发现“悉昙”文字, 对中国佛教史、中印与东亚交流史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及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施甸的悉昙梵文遗址

2017 年 10 月, 笔者与施甸县文化局局长王开洪同志一同去该县向阳镇大竹蓬村考察保山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甸长官司”司署遗址。遗址分为上下两个建筑群, 上院为凤溪寺, 该寺始建于元代, 因几经战火而不存, 清光绪五年(1879 年)重建。当地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九为菩萨圣诞纪念日, 要举办盛大的庙会, 保山、镇康、临沧等地的群众都要来参加共祭。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置凤溪长官司(治在今保山东北老营街), 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其长官与元明先后设立的金齿宣抚司、施甸长官司的土长当皆为契丹后裔。在遗址的大殿旁边, 放置着两块残损的石碑, 其中一块呈立式, 上刻有梵、汉文, 有四佛种子, 中段分为三格式, 从右至左, 右段为 3 列, 每列 6 字, 计 18 字, 中间有汉字隔断; 左断为 6 列, 每列 7 字, 计 42 字, 加上碑首的 4 字, 全碑共计有 64 个梵字。左边有万历七年十二月的汉字, 万历七年为公元 1579 年。碑下有两个尼姑刻像。另一块为断碑, 卧式, 下部有损。碑形为长方体, 碑首有手结契印的密教身体示范形态(密教有身、口、意三密, 身密指身体示范, 意密指默想梵文字的书写, 此碑反映了身密和意密)。此碑梵文刻在正中, 两边为汉文。正文有 10 行; 下面有 9 行, 每行 12 字, 计 108 字(这与密教对 108 字的理解有关联)这块碑的梵字共计 111 个。两碑合计 175 个梵字, 至今无人能识读, 王局长说: “有不少学者猜测是契丹文。”我认为猜测不能作为根据。

回昆明后, 我将石碑上的文字符号发给一些研究梵文的专家, 但都未能找到可识别的人。于是, 我把照片用微信发给我认

¹收稿日期: 2018-04-10

作者简介: 何大勇, 男,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民族史。

识的日本学者高野山大学研究密教梵文佛经的专家奥野直司和赵新玲释读，赵先生复信说：“这是‘悉昙’梵文，内容为《陀罗尼经》。”经我再作调研，特别是到大理密教滋生的村落考察，查阅《石钟健碑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可信的。这个石刻碑文所记录佛经有别于以大理地区为中心涵盖滇境梵字的六字真言咒语。它为研究悉昙文字在云南的流传与分布提供了新的载体。

印度佛教各教派，自古以来有研究悉昙字母字义的传统，显、密诸经论疏皆广泛运用，尤以密教为盛。言及真言陀罗尼时，特别重视悉昙字义之解说。陀罗尼经类同诵咒，因而称咒为陀罗尼，其种类有长短句之分，长句为陀罗尼，短句为真言，一字二字者为种子。因为遗址中发现的碑文均为长句，将碑文定性为陀罗尼经咒是可信的。陀罗尼是梵语 dharani 的音译，意为总持，能总摄各种无量佛法；能持各种善法；能遮除各种恶法。在访问当地信佛的群众时，他们都说，这两块有梵字的碑是“神碑”，能消灾免祸降福。碑所在的遗址为凤溪佛寺，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做庙会时，有远至保山、临沧来的拜佛者，都要与本地的信徒共祭这两块碑，求福求平安。由于有“神碑”和庙中塑有的观音、文殊、普贤菩萨，信教群众将“神碑”视为与菩萨一样的“神物”。

二、悉昙梵文何时传入施甸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回答悉昙梵文何时传入云南？是直接从天竺传入，还是间接从内地传入？

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引王嘉《拾遗记》说：“周成王之时，有旃荼国、纸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老子撰《道德经》，有浮提国人相助；《庄子·山木篇》有建德国，似皆指印度而言。”^[2]周成王为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十世纪初之人，说明中印两国交往可上溯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3]。季羨林说：“在乔底厘耶所著《治国安邦术》里有产生在脂那（即 china）的成捆丝的话，乔底厘耶据说生于公元前四世纪，是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侍臣，据此迟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必已输入印度。……中国、印度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到现在，总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4]在三千多年的中印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汉代以前的交往，都是通过云南而到达内地的。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在有关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史的论述中说：“战国时，蜀、楚与天竺之文化关系，取云南道；战国楚墓中出土有琉璃珠，当由印度传入内地，即取此道；汉代，蜀与天竺之贸易，蜀布、笮竹杖输至印度，亦取此道；后汉开永昌郡，招徕边外诸郡，永昌有僦越、身毒之民，且自永昌出水道通大秦（指南印度）；南朝高僧求法天竺，有取云南道者，知唐以前云南与天竺间之交通，往还不绝。”^{[5]523}

唐代以前，云南虽与天竺有交往，是否有佛教及梵文经典传入云南？史家们作了否定，方国瑜说：“唐代以前，云南尚无佛教可言，虽有传说，亦多诬妄。其确知在云南有佛教者，即唐代始。昆明笮竹寺后山有《无相禅师塔铭》（明景泰四年 1453 年作）曰：‘佛法自汉明时入中国以来，云南远在荒服之外，未闻有奉其教者，至唐其教渐盛。南夷俗，奉佛者尤众，而其盛行，与禅宗大相远矣。’此数语最为确切。”^{[5]523}李京《云南志略》云：“最（盛）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714 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近人徐嘉瑞引胡蔚本《南诏野史》说：“开元二年（714 年），盛（晟）罗皮立土主庙。……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所记佛教入西藏之时代，最早在隋唐之际，则大理密教之始，不能早于西藏。”^[6]万历《云南通志》《滇系》诸书，都记载开元二年，即南诏前期，始有佛教之说。此说之价值，在于它明确记载了佛教及佛经自内地传入云南的时间和史事，但无教义、经典之文字可考，要说那时云南就有悉昙梵文经典是虚妄的。

如上面所说，施甸悉昙字碑之内容，与密教使用的陀罗尼经咒有关。相传南诏“蒙氏保和十六年（唐开成四年，839 年）有赞陀崛多神僧，自西域摩伽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郡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至（原误作晋）天启二年（唐会昌元年，841 年）僧悯，郡地大半为湖，即下山以锡杖穿象眠山麓石穴六十余孔，泄之，湖水遂消，民始获耕种之以利，后莫知所终。”^[7]又同书永昌府《仙释》说：“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叱力者皆服其教。”赞陀崛多，又称室利达多，因自摩伽陀国（在今印度）来，又号摩伽陀。南诏、大理国至元明时期，瑜伽秘密宗阿吒力（梵语 acarya 的译音，又作阿闍黎、阿叱力、阿拶哩等），僧笃信赞陀崛多之秘密法，并以其为祖师。《大理张胜温画长卷》第五十六开有赞陀崛多像，说明他是阿吒力密教僧之共尊者。密教的特点，是以咒术降神降妖异事，所用经典为陀罗尼，能否说施甸的悉昙梵文经是由赞陀崛多自印度传入的呢？因史籍无征，不能肯定，只能说有可能。元、明时，特别是

明，密教盛行于大理地区。元明时，“大理、宾川、邓川、鹤庆一带之古墓群甚多，有碑称阿吒力僧，或称阿吒力书咒，刻梵文咒语，可见其教之盛行。”^{[5][529]}石钟健辑录的《大理喜洲弘圭山明代墓碑录》第一辑《大阿拶哩杨嵩墓志铭》说：“其先有杨珠、扬珠觉二师，本天竺国婆罗门之种族也。观音定国之初，先建叶榆，请二师从西来。”又明景泰二年（1415年），大理鹤拓密僧洪仁撰的《故考大阿拶哩段公（生）墓志铭》云：“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耶族，姓婆罗门，从梵天口中而生，教习秘密大道，唐贞观己丑年（贞观三年，629年），观普大士自乾竺（指印度）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翊王度，下以福佑人民，迨至南诏奇壬之朝，大兴密教。”所谓“观音大士”，即佛教菩萨之一，被尊为救苦救难之神，也叫观自在，俗称观音或观音大士，在此指白族密教阿吒力所崇拜的“阿嵯耶观音”大密法师。所谓“流传密印”，是指根据密教之根本教义，诸佛菩萨皆有本誓，为标示此一本誓，常以两手合十指或某一特殊身誓动作，显现种种相，以此为本誓之印相印契，故称之为“密印”。这块碑记述了密教传入大理地区的时间、僧名、译咒翻经及修行以“密印”六式进行的种种信息。又《杨公墓志铭》（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杨公玮宝，字廷贵，乃西竺人……先人原中印（原误作丘）土婆罗门种。”此碑文又述及来自印度之密僧之事。有些内容可能是根据传说，但当有所本。明代阿吒力僧墓志铭普遍都将自己的祖师上溯至唐代西来大理的天竺僧，这些碑铭多刻梵文咒语，可作为考定施甸悉昙碑文的时代和流传地的重要资料之一。

1 可以说，施甸的悉昙梵文，当是唐代贞观三年（629年）至开成四年（839年），由西来天竺僧首传至大理等地，明代“译咒翻经”，再进一步从大理传去施甸。施甸的悉昙碑刻，当为临摹唐代从印度传来大理的悉昙体陀罗尼经所成。李京《云南志略》、胡蔚本《南诏野史》等所记开元二年（714年）因玄宗所赐，云南始有佛教、佛书之说，只能存疑待考。

三、施甸长官司与悉昙梵文碑

悉昙梵文碑发现于施甸长官司遗址内，说明这两块碑与该长官司有密切的关系。《读史方輿纪要》卷118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石甸长官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千（阿苏鲁）为副长官，赐冠带。”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村蒋文良保存的《施甸长官司族谱》说：“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鸢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府）正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又《勐板蒋氏家谱》说：“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此家谱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勐板的蒋家云所收藏。）这两个家谱说明，施甸长官司长官、金齿宣抚司（治干崖，今盈江县旧城镇。元中统二年，1261年置金齿安抚司，至元八年，以潞江为界，分设东西安抚司。十二年改西路为建宁路安抚司，仍以干崖为治；东路为镇康路安抚司，治所在石甸，即今施甸，为副职。至元十五年，1278年合并为金齿宣抚司。）世袭土长都是随蒙古军南征的契丹人中的有功者。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随征的契丹人二千余人，得恩准在石甸屯垦，为感恩朝廷，契丹人特意将原地名“石甸”改为施甸。据《辽史》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契丹国太祖一年（907年）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916年，废可汗称帝，宣告契丹国建立，亦称大契丹国（即辽朝）^[8-9]。1125年，被女真阿骨打所灭。元初世祖忽必烈南征，有契丹后裔随征大理国，有蒋氏先祖“以功授武略将军”及被封为施甸长官司和金齿宣抚司的世袭土官。

契丹人信仰佛教，贵族“崇佛耽乐”^[10]。因此说施甸的悉昙文，是由随元军南征的契丹人带来的，在无充分史料为证前，是不应认同的。在施甸长官司遗址大殿左边的建筑有“纵横万里福光长照，赵州谈经二王供养”的楹联，所谓“纵横万里福光长照”，指施甸长官司长官来自遥远的福地北方辽国，再来到新的福地施甸；“赵州谈经二王供养”，指施甸、凤溪两个长官司长官去大理赵州（凤仪）听密教阿吒力僧谈经颂咒后，对大理地区盛行的密教进行崇信的情况，所以，该楹联的横联以“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来赞许阿吒力僧的咒术。晋《莲社高贤传·道生法师》篇有“竺道生人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群石皆为点头”之语，横联像当年人们赞扬印度僧人那样来赞扬阿吒力僧。施甸、凤溪两个长官司的属民除当地的土著民族之外，是来自北方的契丹人，契丹人经济、文化发展比当地的土著民族先进，契丹土长被封为长官司土官后，南来的契丹人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将盛于大理赵州（今凤仪）等地的阿吒力密教引入施甸，并把自唐、宋、元以来传承的密教悉昙文陀罗尼经刻石保

存，供人祭拜是可能的。明洪武年间，施甸长官司在今由旺镇建立西竺庵佛寺，以祭祀天竺密教诸神及西来的梵陀崛多（摩伽陀）神僧，悉昙陀罗尼经典当也在被祭祀之列。施甸长官司司署遗址内还收藏着两块悉昙字碑，因无人能识读，当地把它作为神物保存起来。

辽国契丹族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历史民族共同体，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创造和发展中华民族光辉文化的业绩，将永世长存。施甸县的契丹人后裔，至今仍把其祖先在施甸应用和保存悉昙文的作为，视为契丹人对发展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四、余论

第一，考古学家曾在大理发现主体南诏时期的梵文字瓦。在昆明地藏寺发现大理国时期的悉昙梵文经幢，该幢第二层分刻四天王，天王之间分刻梵文陀罗尼经。这个石幢之梵刻，约高二十五寸，径长约二十寸，下部有浮雕之佛像，四面皆有文字，半为中文，半为梵文。方国瑜先生曾请李埏教授翻译德国学者李华德所撰《云南梵文石刻初论》一文作参考进行研究，李华德认为，昆华图书馆所藏梵刻，“梵文则悉昙（Brahmi）也。右行下一部分间为佛像所断。中文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人匠提举杜昌海之《墓志铭》。图书馆尚有另一幢大小相若，时则泰定元年（1324年）也。梵刻与前幢同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Usnis-vijaya-Dharani），此咒在密宗（Tantrasesect）中固甚普遍之文也。若以此二已知之神咒梵刻比较之，则知吾辈所译，乃最近于善无畏（Subhakarasiṃha）所作者，善无畏即《大日经》之作者，世称之为‘育干达拉’（Vugandhara），曾于唐初来华。然以有若干附加及重复之文，故其长较原本增约三分之一。梵文 Vajrabhartumama (Sariram) 意为吾体将化为一 (vaja)，之后有中文‘追为慈考杜昌海神识’数字插入，可以此与 FMax Miller Sarvadurgati - Parisodhana - usnisa - vijaya dharani (Auecdota Cxnieusia 1884) 比较，惜是篇未能耳”^[1]。李华德的研究说明，元泰定年间的梵文石刻，皆悉昙体梵文，这为我们深入研究施甸悉昙碑提供了可作比较研究之资料。但悉昙梵文的识读在今天已成为我国的绝学，只有待我国的绝学研究取得进展后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认识。

第二，大乘佛教分显、密二宗，密宗即密教。密教根据教义不同，分为金刚乘、持明乘、俱胜乘、时轮乘等。根据修炼之不同，又分真言密教、瑜伽密教等。因为依真言陀罗尼之法门修五相、三密等妙行，所以又称陀罗尼密教。密教依传播地域不同或民族不同，又分藏密（分布在我国以西藏为中心的藏族地区）、滇密、白密（分布在我国云南昆明及大理白族地区）、东密（分布在日本）、台密（分布在我国台湾）、华密（分布在我国五台山、峨眉山等地）。施甸的陀罗尼密教，当是由大理白密法师阿吒力传去的。学术界对是否有滇密、白密，存在有不同的意见，侯冲教授指出：“所谓‘滇密’、‘白密’并不存在，大理密教属于汉传佛教，南诏大理至元代的云南佛教，是汉传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所谓阿吒力教，是明代传入云南的瑜伽教及其遗存。”^[12]所论资料翔实，观点新，可作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第三，施甸悉昙文碑是契丹人融入云南土著，传承白族阿吒力密教的产物，对促进今天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政治意义。建议国家将悉昙碑所在的施甸长官司遗址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省级、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文献：

- [1] 智广. 大正藏第 54 卷悉昙字记（1 卷）[M/OL]. [2012-02-05]. <http://chatz.fjnet.com/html/kk/zip/中华佛典宝库大藏经/03 论部/17 事汇部. 外教部. 目录部（2121-2184）/事汇部（2121-2136）/2132.txt>.
- [2] 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6 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7. [3] 何耀华. 何耀华文集：第一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39.
- [4] 季羨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 季羨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2:117.

[5] 方国瑜，林超民. 方国瑜文集:第二辑[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6]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 李家瑞，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8:311.

[7] 李元阳，邹应龙. 万历云南通志：卷 13:鹤庆军民府. 仙释[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8] 脱脱，等. 辽史:卷 1[M]. 北京:中华书局，2003:2.

[9] 脱脱，等. 辽史:卷 33[M]. 北京：中华书局，2003:387.

[10] 王钟翰. 中国民族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57.

[11] 方国瑜，林超民. 方国瑜文集:第四辑[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264-265.

[12] 侯冲. “白密”何在[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86.